



鲜

卑

邱 久 荣

鲜卑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关于鲜卑的族源，文献记载纷纭，一说是炎黄子孙，世居北方，如《魏书·序纪》说鲜卑拓跋氏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鲜卑慕容氏是有熊氏之苗裔；《周书·文帝纪》说鲜卑宇文氏出自炎帝神农氏。这些说法都是鲜卑“入主中原”后出于政治目的的假托，不足信。一说是汉人北逃后发展起来的，如东汉应奉认为鲜卑是秦修长城逃出塞外的囚徒；沈约《宋书·索虏传》说拓跋氏是李陵之后，这些说法亦无任何根据，纯属附会。一说是东胡的一支，东汉以来的学者多持此种看法，如胡广、陈寿、范曄等，这一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东胡见于文献记载比较早，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的东北方。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落分散，并北迁。东汉初年，鲜卑的活动开始出现于史籍，当时他们的势力已发展到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那么鲜卑又是在北方何地发展起来的呢？史称鲜卑“以山为号”，即他们居住在鲜卑山，以山而得民族名。但鲜卑山在何处？一直使史家迷惑。1980年7月，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嘎仙洞内发现了鲜卑拓跋部祖先的“石室”，证明了大兴安岭北段即是文献记载的大鲜卑山，终于解决了中国古代史上一大疑案。据此可以推论，东胡的一支北迁后，因居住在鲜卑山一带，而得名鲜卑。大约在西汉武帝时，随着匈奴势力衰弱，鲜卑开始南徙。但因他们地处乌桓（东胡的另一支系）之北，与西汉无来往，故史文不及。

东汉初，鲜卑与东汉发生了交往，并与乌桓、匈奴、东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被迫第二次西迁，



于是鲜卑以扇形之势向西南纵深地带迁徙,填补了匈奴人留下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当鲜卑控制了北方大草原之时,不少匈奴人被融合到鲜卑之中,《三国志》裴注引《魏书》称:匈奴西迁后,“余种十余万落(落相当于户),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在此次之前及以后,亦当有大量匈奴人融合到鲜卑之中。所以北周皇族宇文氏、北朝大姓独孤氏,追根溯源,都是出自匈奴,也就可以理解了。大批匈奴人成为鲜卑的一部分,无疑壮大了鲜卑的势力。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恒帝年间),在著名领袖檀石槐领导下,以弹汗山(内蒙古商都县附近)为中心,建立起东至扶馀、西接乌孙、北距丁零、南至塞北的强大部落联盟。檀石槐分其地域为东、中、西三部,每部有一二十个部落,分设大人(犹如匈奴之单于)统帅。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1年),檀石槐死,其部落联盟随之解体。三国时,上谷塞外的柯比能部又一度强盛,“尽收匈奴故地”;与此同时,檀石槐孙步度根及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的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等势力亦较强大。西晋时,鲜卑各部继续内迁,其中一些部落开始转为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并开始封建化。特别是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大批流民北徙,与鲜卑杂居,加速了鲜卑人的封建化过程。随着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八王之乱”以及匈奴人刘渊建汉国,使北部中国政治出现了混乱局面,于是鲜卑各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其中辽西的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代北的拓跋部以及河西走廊各部都非常强盛。所以在西晋灭亡后的年代里,鲜卑各部亦先后建国,成为“五胡十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慕容部先后建立了前燕(337—370年)、后燕(384—407年)、西燕(384—394年)、南燕(398—410年),秃发部建立了南凉(397—414年),乞伏部建立了西秦(385—431年),拓跋部建立了代(315—376年)。慕容部不仅建立了四燕国,而且前燕、后燕都曾一度控制关东广大地区,在“十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淝水之战后,拓跋珪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旋称魏,史称北魏,至公元439年,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混战局面,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从此至杨坚建隋为止,北方政局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合称为北朝),但鲜卑一直是北朝的统治民族,他们完全统治北中国达一百四十余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鲜卑在我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鲜卑势力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并长期统治北方,除了外部的有利因素外,就其本身来说,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鲜卑南迁过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很快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由游牧经济转为定居的农业经济,这一点是匈奴人所不及的。其次,鲜卑贵族十分重视与汉族土族相结合,其中慕容部尤为突出,早在西晋末年慕容廆时期,就在辽西招徕中原流民,为他们设立侨郡;投归的汉族土族不仅为慕容廆谋划于帷幄,而且也是前燕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慕容部能够先后建立四燕国、两度控制关东广大地区的重要因素之一。北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这种结合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崔、卢、李、郑等汉族土族势力都得到一定发展。在婚姻上,从燕国、北魏、北周皇室到一般鲜卑贵族,与汉族土族联姻已是司空见惯。表明鲜卑贵族与汉族土族完全结为一体。再次,鲜卑贵族自觉地采取了汉化政策,它集中表现在魏孝文帝以法令形式推行汉化,如改穿汉人服装,禁止使用鲜卑语,改复姓为汉族的单姓(如拓跋而为元),并将都城由平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南迁的鲜卑人以河南为郡望,死后葬在洛阳等。也许有人认为改姓算不了什么大事,其实不然,《魏书·陆叡传》记载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在魏孝文帝未改汉姓前,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把女儿嫁给了鲜卑贵族陆叡后,很不满意地对亲信说:陆叡“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陆叡鲜卑姓为伏鹿孤,鲜卑名为贺鹿浑,姓名合为六字,这与当时汉族姓名多为二字相比,相差太大,而且“鹿”字在姓名中重出。可见这种形式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民族间的友好关系。魏孝文帝的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是强制性地使鲜卑人彻底汉化,这在“入主中原”的古代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很显然,魏孝文帝这样做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大大加速了北方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它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之间,也表现在各族广大人民之间。所以高度地评价魏孝文帝,肯定他在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崇高地位,是非常正确的。



鲜卑贵族进入中原后，一反魏晋以来士族集团的颓靡之风，给北方社会带来了朝气，为缔造中国文明的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典章制度上，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的均田制，西魏宇文泰推行的府兵制，不仅为恢复和发展当时的社会生产、加强军事力量起了一定作用，同时这两种制度一直沿袭到唐代中期，对隋、唐的繁荣和强盛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文化上，不论慕容氏还是拓跋氏、宇文氏，他们都尊崇儒学，排斥魏晋以来风靡于上层社会的玄学，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南北截然不同的风格。正由于这种种原因，北方社会的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所以北魏末年才出现了《齐民要术》这部不朽的农业科学著作。同时，北方经济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增强，为全国重新走上统一创造了条件，隋文帝完成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业，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罢了。

公元 581 年，杨坚代周建隋后，鲜卑不论作为政治实体还是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差不多完全融合到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但他们的后裔在隋唐社会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隋、唐建国者的祖先都起家于北魏军事重镇武川（内蒙古武川县附近），实际上他们是鲜卑化了的汉人，饶有趣味的是，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母独孤氏、唐高祖妻窦氏、唐太宗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所以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是混血儿；而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母独孤氏都是北周大官僚独孤信之女，因此隋炀帝与唐高祖还是姨表兄弟呢。这种姻媾关系，不仅表明了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深度，也说明鲜卑人后裔在隋唐社会必然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隋代历史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杨坚取代北周前夕，北周宗室宇文招企图诱杀他，在鲜卑人元胄的护卫下，才得以脱险；杨广弑父篡位，鲜卑人宇文述功劳极大；而隋末在江都杀死炀帝的又正是宇文述的两个儿子宇文文化及、宇文智及，这一切决不是历史的偶然性，正反映了鲜卑后裔在隋代政治生活中的强有力的地位。纵观隋唐两朝，鲜卑后裔做宰相者达二十余人，至于中央六部的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不胜枚举，其中隋代大建筑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坛上的名星元稹等都是我国古代史上著名人物。由

《文心雕龙》中的辩证思想蠡测

上海市虹口区新力热工电器厂青年工人

吴信明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它体制详尽，论旨精深，内容丰富，析理缜密。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史上，还难以找到什么论著能同这部被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的名著相比。特别是《文心雕龙》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尤其值得重视。

辩证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反对片面的、表面的认识，要求从普遍的联系中全面地看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详述了《文心雕龙》成书的原由，其中之一就是不满意魏晋以来的文论著作所存在的某些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点。他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论点严密，可是不周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善于辩论，可是不恰当；应瑒的《文质论》有文采，可是粗糙疏漏；陆机的《文赋》文辞工巧，可是叙述杂乱；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辟，可是不切实用；李克的《翰林论》浅显，可是又不得要领。指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此，刘勰认为必须克服这种表面性和片面性，写一部“弥纶群言”、“深极骨髓”的文论专著，来探究“为文之用心”。这种力求全面、力求深入的指导思想，使刘勰能一开始就站在超越前人的理论思

维的高度上，为《文心雕龙》规定了

青年园地

此可见，鲜卑人在我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以及他们在缔造我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当然，鲜卑与东汉、曹魏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十六国”时期的混战，对北方社会经济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一定灾难；北魏后期，鲜卑贵族也十分腐朽，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北朝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压迫，等等。但这些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